

调研笔记·数字文化②

委员 笔记

岳麓书院考察记

连玉明



▲连玉明委员在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来过多次，但这次不同。参加由邵鸿副主席率队的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的“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活动，岳麓书院是必选之地。这座“千年学府”，不仅是每一个读书人的精神家园，更是湖湘文化的圣殿、中华文化的地标。这几天调研考察的湖湘文化，更加印证了岳麓书院大门上的那副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岳麓史话

在历史名城长沙的岳麓山下，滚滚波涛的湘江两岸、古木参天的清风峡口，幽静、古朴、典雅的岳麓书院就坐落于此。在这里，既有山水相融的清秀、泉洁林茂的恬静，又有白墙青瓦的素雅、回廊相连的清趣，既有对“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敬仰，又有对“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的感叹。

岳麓书院萌芽于唐宋五代，创建于北宋初年。直至咸平二年即公元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重新扩建，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创建礼殿、请辟水田，标志着岳麓书院讲学、藏书、祭祀三大规制已经形成，从而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王禹偁的《潭州岳麓山书院记》说：“使里人有必葬之志，学者无将落之忧。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他把湖湘比作孔孟家乡的“洙泗”“邹鲁”，正是对岳麓书院历史功绩的肯定和称赞。此后，由于一代代学术大家、教育家苦心经营，岳麓书院遂成为宋代著名书院中规模最大、规制最完善、保存最完整、人才培养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书院，成为中国书院史、中国教育史的杰出典范。

“讲于堂、习于斋”是岳麓书院讲学的基本规制。经头门，过大门，进二门，才能到达岳麓书院的讲堂。讲堂最初创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即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设计讲堂五间。历经宋、元、明、清至今，几经风雨，屡毁屡建。现存建筑为清康熙二十六年即公元1687年偏沅巡抚丁思孔重建，经同治七年即公元1868年大修后的遗构。讲堂正中设高约一米的长方形讲坛，为古代老师授课的地方。上摆两把红木雕花座椅，为山长和副讲席位。讲台之后为木质屏风，上刻山长张栻撰写的《岳麓书院记》。讲堂南北两壁嵌刻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和欧阳正焕手书“整、齐、肃”大宇碑，均为道光七年即公元1827年山长欧阳厚均刊立。檐前悬有“实事求是”匾，中央悬挂康熙二十六年即1687年御赐“学达性天”和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御赐“道南正脉”两块烫金木匾。讲堂两侧刻有清代山长旷敏本（公元1699~1782年）撰联：“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讲堂外侧建有教学斋和半学斋。“教学斋”源出《礼记·学记》：“建国居民，教学为先”，门联云：“业精于勤，漫喜嬉戏思鸿鹄；学以致用，莫把聪明付蠹虫。”“半学斋”源出《尚书·说命》下：“惟学半”，意为教人是学习的一半，引申为半教半学，门联云：“惟楚有材，三湘弟子遍天下；于世无偶，百代弦歌贯古今”。岳麓书院作为湖湘学派的教育基地，培养出一批“岳麓巨子”。杰出的思想家王夫之、魏源、叱咤风云的“中兴名将”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曾国荃、刘长佑，革命志士谭嗣同、唐才常、沈葆、熊希龄、杨昌济，以及民主革命先驱黄兴、蔡锷、陈天华、程潜等，都在岳麓书院的教育和影响

华夏



本报记者 杨雪 摄

下，为中国历史写下可歌可泣的华丽篇章。其中，魏源成为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提出者，曾国藩成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启者，谭嗣同成为为戊戌变法流血牺牲第一人，黄兴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将或总司令。

朱熹讲学与王学传播

在岳麓书院的发展史上，有两个人至关重要。一是朱熹，理学大儒；一是王阳明，心学大师。南宋岳麓书院的繁荣，与著名理学家朱熹讲学联系紧密。朱熹来岳麓书院讲学有两次，一次是乾道三年应张栻邀请的朱熹讲学，讨论问题十分热烈，“三日夜而不能舍”，以至“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开创岳麓自由讲学之风；另一次是绍熙五年的重建书院。这次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至潭州，兴学岳麓，以治教为重，颁布“朱子书院教条”，把“学、问、思、辨、行”规定为“为学之序”，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学规，助推书院蓬勃发展。明代书院的发展，与王阳明心学的兴起有关，岳麓书院也是如此。正德二年即公元1507年，王阳明因触犯大监刘瑾而贬贵州龙场，途经长沙，来到颇负盛名的岳麓书院讲学，这是他宣传心学理论的开始。在当时岳麓盛理学、重科学的时风下，王学使人耳目一新。此后，王阳明再没来过岳麓，但他的弟子、再传弟子如浙中王门季本、江右王门罗洪先、浙中王门张之仆、江右王门邹元标相继来此登坛讲学、传播王学，产生较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乾道三年朱熹讲期间，朱熹常与张栻相约，登岳麓山顶日出，并将观日的地方命名为赫曦，张栻修筑“赫曦台”，朱熹题额，二人留下《登赫曦台联句》：“泛舟长沙渚，振策湘山岑。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犹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正德二年，王阳明寓居岳麓书院期间，游朱、张遗迹，也写下《望赫曦台》诗云：“隔江岳麓思情久，雷雨潇湘江夜来。安得轻风扫微雾，振衣直上赫曦台。”1917~1919年，青年毛泽东曾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赫曦台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955年6月，毛泽东回到湖南视察，由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周世钊陪同重游岳麓。毛泽东赋诗再次表达近30年之后重返长沙、重登岳麓赫曦台的豪情壮志：“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先哲往圣的哲理诗篇，正契合赫曦台的联云：“合安利勉而学，通天地人之谓学。”

我的书院观

考察岳麓书院，犹如经历一场千年湖湘文化的风雨洗礼。置身于这座饱经沧桑的历史殿堂，一步三叹，流连忘返，自由而清新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古朴而常新的思想之光直插人心。

创办书院是我人生的梦想。在贵阳挂职期间终于梦想成真。2015年10月，经贵阳市委批准，由贵阳市政协支持发起成立阳明文化（贵阳）国际文献研究中心，并由贵阳市人民政府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共建北京阳明书院。书院临时地址位于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书院永久馆址正兴建于莲花河畔。北京阳明书院依托首都资源，于贵州和贵阳创建古籍文献馆、方志文史馆和梵净艺术馆，改建“北京阳明书院附中和小学”，新建“阳明文化（贵阳）国际文献研究中心”，初步形成“三馆两校一中心”的书院格局，正在努力打造成为阳明文化的传播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者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推动者。

“藏书、研究、交流、服务”是北京阳明书院的四大功能。书院致力于阳明文化文物普查、收集、整理、研究和交流工作，在国家文物局和国家图书馆批准和支持下，已完成166种王阳明馆藏典籍和庐山纪功碑、修道说碑两件国家一级文物的高仿复制工作，共复制王阳明馆藏典籍善本、普古、碑拓、法帖等56191拍、影图112382张，包括王阳明家谱传记、思想渊源、著述文章、弟子著述、后人阐释等，现藏于贵阳阳明中心和北京阳明书院，成为我国除国家图书馆外唯一、独特、权威的可供研究、可利用、可传播的重要典籍文献。正在整理、研究、编纂和出版的《王阳明馆藏文物文献全集》（600卷）作为阳明文化文物文献研究最新学术成果，成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标志性项目。已开发建成并上线运行的“数字王阳明资源库全球共享平台”拥有全球87个国家、420个城市注册用户三万余人。网站独立访问量近500万人次。这也是契合我们此次调研主题，算是在我致力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一个举措吧。

北京阳明书院虽刚刚起步，但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相通的新生力量，饱含智库特质、弘扬公益精神、闪烁思想光芒，以岳麓书院的文化坐标为灯塔，走向未来，走得久远！

（作者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副主席，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一笔敬鲁迅，一曲动心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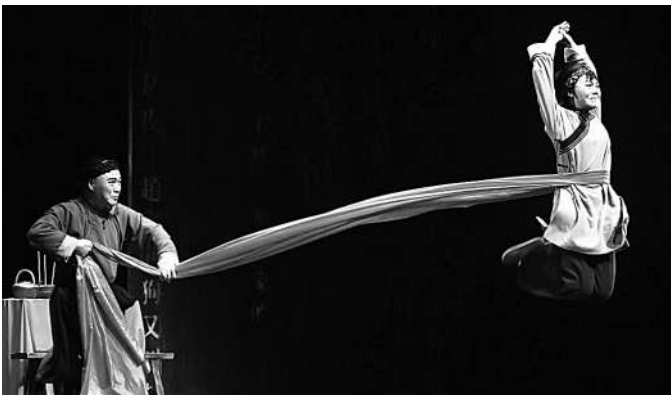
——观河南曲剧《鲁镇》有感

田沁鑫

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是在1924年2月份写的，应该是湿冷的季节，就像小说中人物命运一样的寒凉。《祝福》后来收入在小说集《彷徨》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篇目。

近百年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对小说中的人物、环境、情节和主题等要素，有过多重解读和评论，主要集中在人物命运和悲剧根源的探寻。对于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我”的分析略有缺失，难免遗憾。但是，在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创作的大型原创曲剧《鲁镇》中，在剧作家陈涌泉先生笔下，“我”这个角色，作为叙述者独放光彩，呈现了三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有直接发生的对话（与祥林嫂）；有所见鲁镇环境和生活情况的展现（实际的社会状况缩影）；有发问和内心的呐喊（是思考和求变）。编剧在熟谙鲁迅写作用意的情况下，将这个“我”展现在多变时代中的不变环境中，在“现实与过去，真实与



▲河南曲剧《鲁镇》剧照

虚幻”中，通过“我”展现了思想内涵。编剧选取鲁迅多篇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等，将不同类型的故事进行组合，展现多变的叙述方式，实现了鲁迅原著改编的新突破。

二是关于祥林嫂在剧中的重点呈现，编剧创造了北方剧种塑造和描绘南方女性角色的内心伸张和外化。这个堪称现代文学中最具悲剧特质的女性，在编剧陈涌泉笔下，有见其倾诉“寡娥之冤”的愤懑呐喊，却不如寡娥无语无解的委屈唱段的细致表达；有见贺敬之写“白毛喜儿”之“恨是高山仇是海”的咏叹抒发，却没有喜儿的良好未来。祥林嫂的命运被反复“敲打”，强烈的戏剧冲突伴随激烈的人物命运冲突，夹杂在祥林嫂矛盾的命运中间。编剧的写作方式，见“喜儿”的力道和“寡娥”这般的功力。这次曲剧创作，编剧陈涌泉先生把鲁迅笔下的重点悲剧女性形象，以极大的悲悯之心、练达的“酣畅”笔力，刀斧剥出封建制度下这个命运多舛、过度悲惨的女性，在编剧的笔下，在舞台的中央，她的悲剧形象，“顶天立地”！

三是剧本的结构呈现。近几年，戏剧创作不乏优秀作品，戏剧编剧也在尝试非线性写作方式的探索和运用，河南曲剧《鲁镇》是杂糅鲁迅其他作品，完成度极高的一次典型故事的成功探索，是戏曲创作中向多元结构空间发展的一部高质量空剧。

张曼君导演是戏剧舞台上一位造诣极深的创作



▲河南曲剧《鲁镇》剧照

高手，始终锐意进取，守正创新。此次导演曲剧《鲁镇》，将鲁迅众多作品中的场景浓缩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空间，舞美构成多元又简洁，呈现高级。音乐创作有新突破，让曲剧与民族歌剧相通相惜、互为表里，丰富了曲剧的音乐调性。

祥林嫂的扮演者李晶花，唱作念俱佳，表演极富戏剧张力，结尾处，当演员与角色交融演唱到动情时，演员调动内心和形体的表现共同发力，催动全剧高潮，唱腔激昂，不可多得。

祝福曲剧《鲁镇》剧组，继续守望前行，更上层楼，以弘扬民族精神为己任，传承鲁迅精神，为民族文化意识的重新提振，多做贡献。（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国家话剧院院长）

文博 随笔⑤

黄河中上游是中华文明富集地之一，发现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邵店村距今7800年的大地湾彩陶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彩陶。1923年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的马家窑村的马家窑文化，以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向世人展示了图案精美、内涵丰富、数量众多，达到顶峰的彩陶文化。1924年在甘肃省临洮州广河县齐家坪首先发现的黄河中上游齐家文化，反映了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文化形态。1950年在临洮州积石山县的三坪遗址出土了距今5000年的中国“彩陶王”，1978年在临洮州东乡县林家遗址出土了被认定为目前中国最早的一把青铜刀，两件文物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青海海和县喇家遗址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面条”。考古发现证明，黄河中上游古文明无疑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渊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

毋庸置疑，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的演进路径中，处于黄河中上游的甘肃古文明遗址占有一席之地。关于黄河中上游古文明遗址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院历史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在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西北地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区域，对于它的起源、形成时间以及与周边区域的关系，都有待通过新的考古去发现。”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十三届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上，我提交了“关于加大黄河中上游古文明遗址‘全域’保护利用”的提案，被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三次主席会议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审定为重点协商督办提案。相关部门的督办成效明显，黄河中上游的史前文明受到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逐步重视，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1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韩建业教授带领团队，联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甘肃庆阳的南佐遗址启动了新一轮考古工作，此外还曾多次召开“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学术会议，2023年5月8日，在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局、甘肃临夏州委州政府共同主办的“文明汇聚·光耀河州——史前文化临夏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中国彩陶之乡”临夏州，围绕深入挖掘史前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研究阐释临夏地区在史前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等展开广泛讨论。本次论坛聚焦史前文化、探寻中华文明，事关中国文化起源和格局问题，对于认识中国古代文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专家学者一致认同，黄河中上游的史前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家窑、齐家等文化，林家、半山、齐家坪等遗址，

彩陶、玉器、青铜器等遗存，不仅展示了当地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成就、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内涵，而且对认识同时代的中国史前格局具有全局性意义，在研究中国文化起源和格局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后续对甘肃古文明遗址的多部门、多学科联合挖探考古研究将持续进行。

笔者曾经对黄河中上游的保护利用较为成熟的甘肃大地湾遗址、青海喇家遗址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进行过考察。大地湾遗址包括大地湾博物馆、F301原始村落遗址和F901原始宫殿遗址三个参观区域。1988年大地湾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12月31日，大地湾博物馆建成并免费对外开放。2013年，大地湾遗址被国家文物局立项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青海喇家遗址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当年我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不断推进，黄河中上游的许多古文明遗迹进入了学界和相关社会领域的视野，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对黄河古文明遗址的综合保护与利用在有些方面也是不尽如人意的，首先，对黄河中上游古文明遗址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认识不足，该区域古文明遗址有些“藏在深闺人未知”的感觉，没有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攻关研究。更让人担忧的是遗址地生态环境较差，经济条件落后，有多处重要遗址还未列入国家古遗址保护名单，众多文化遗址和文物正在面临被破坏和消失的困境。例如，位于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齐家坪遗址处于强湿陷性黄土带，雨水、农业灌溉等造成的水土流失、地面塌陷甚至滑坡等地质灾害对遗址本体和环境造成直接破坏或形成潜在威胁。还有遗址范围内目前常住110户群众，村庄民房、农业生产、架空线缆、生活垃圾影响着齐家坪遗址环境风貌，也在侵蚀着文物，造成破坏和消失的窘境。还有，当下对黄河中上游古文明遗址开发利用程度不高，缺乏深度体验和品质提升，综合开发体系不够健全。甘肃临夏境内出土“彩陶王”的积石山三坪遗址、广河县齐家坪遗址尚未挖掘，对重要遗址节点没有向公众开放展示，未能发挥这些史前保护遗址的社会价值。

黄河中上游古文明遗址对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探究中华文明的内涵、外延等重要考古支撑，对讲好中华文明和黄河文明故事，进一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增强黄河中上游古文明遗址赋能区域综合发展的效益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需要调动多方力量，多学科攻关，夯实黄河中上游古文明遗址挖掘研究进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基础。尽快争取将该区域古文明遗址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攻关研究项目中。借助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助力该区域古文明遗址的系统性研究和保护，为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作出该区域的贡献。

在遗址保护方面需要尽快有计划完成重点保护遗址的文物保护单位规划，规范遗址保护区划内的生产建设活动，对遗址核心区生活的居民进行搬迁，对遗址核心区水土流失进行治理，下大力气对遗址文物本体和周边环境做好综合保护。当然，更要围绕黄河中上游古文明

行走 在 黄河 古文明遗址上

马东平（回族）



▲黄河刘家峡水库

遗址推出更多考古成果，并做好考古成果的阐释、普及和宣传工作，让文化成为最富魅力、最吸引人、最具辨识度的标识，挖掘该区域古文明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运用各种现代媒介手段和平台，讲好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中华文明故事，提升黄河中上游古文明遗址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在保护黄河中上游古文明遗址的过程中，根据遗址保护、利用的现实发展需要，多种方式开展展示利用工作，彰显史前遗址的当代价值，充分发挥文物资源的综合效益。特别是对文化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通过加快推进相关遗址的发掘保护利用工作，创新古遗址的展示方式，让古遗址保护成果更多惠及群众，让遗产地百姓共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成果。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